

我们愿意听

更多内容请见 www.hzrb.cn/西湖副刊

猪倌

倾诉你的故事

口述:鲍文华 整理:陈永耀

逃荒出来,自然没有田产,只能靠力气挣饭吃。



我今年74岁,除了换了副牙齿,白头发没几根,眼睛看报纸没问题,吃饭睡觉青壮年一样。公司的事情都交班给儿子儿媳了,闲不住,厂区后头有两亩空地,我一人全包,用来种有机蔬菜和青饲料。

回头想想,我的人生也算完美了。赚到的钱,虽不能跟大老板比,但是也有好几千万家产了,而且都是实打实的净资产,得到过的荣誉、奖项上百个。我和老太婆结婚五十多年没红过脸,有三个子女,大家族,家庭和美,关系融洽,子女小辈也都很争气,都努力走正道,有出息。

我现在长住地临安於潜,40岁之前我是昌化河桥的山里人。我父亲和爷爷,原是淳安县汾口人,爷爷带着我父亲逃荒出来,才落脚到昌化河桥镇寺坞里村,一个很偏远的山坞角落。

逃荒出来,自然没有田产,只能靠力气挣饭吃。

当时寺坞里有个很有名的寺庙,叫法会寺,就是现在的马路两边,一边叫韦驮湾,一边叫罗汉湾,有好几十间大殿僧房,供奉着弥勒佛、观音菩萨,“文革”时整块木头雕刻的观音烧了三天,都烧光了。

寺庙始建于晋朝,每年农历二月十九、九月十九,远近有好几千香客都来参加法会。最兴盛时,庙里和尚有五六百个。那时法会寺有自己的庙产,几百亩山林,十几亩田地,寺庙的负责人见我爷爷和父亲勤劳肯做,脑子也聪明,就请他们种植田地、管理山林。庙里不需要他们上交租金,只是每年的两次大法会和平时来庙的香客,要我们家免费提供伙食,算是冲抵租金。

爷爷父亲打理庙产井井有条,农闲时还抽出时间,另外做些辛苦生意,贩生丝、炼土硝、贩小猪。

淳安老家那边有一种小花猪,品种不错,皮薄肉质好,昌化农民都爱养。爷爷父亲就去淳安收购苗猪,再贩到昌化这边卖给乡亲,赚个差价。来回有三百来里路,大部分都是山路,每趟要赶一两头小猪,三四个人带着铺盖、干粮,还有猪吃的精饲料,跑一趟要好几天。

担心小猪长途跋涉,脚嫩会吃不消,还得给每头猪的四只蹄子套个小草鞋。正常赶路不必担心,只是慢点,怕就怕过河过桥,小猪跟群,如果前头有猪不小心落水了,后头的猪仔照跟不误,“扑通扑通”全都主动下水。那麻烦就大了,桥高水急,就会淹死、摔伤、冲跑、炸群,那损失就难说了。

解放后划分阶级成分,我家划成了佃富农。按照当时的政策解释,应算是成分好的,但可能有个“富”字吧,到搞运动时,我们家的实际待遇其实就算“四类分子”,也就是剥削阶级,是和地主、富农同一类的“坏人”。打上了这个印记,日子自然更难过。有一次,我五弟和贫下中农的子女吵架,对方气势汹汹指着鼻子骂我家老五:“你们家是什么人啊?四类分子!没有说话的份,我叫你们圆就圆,叫你们扁就扁,你们一辈子也别想翻身出头!”印象深啊!

我1943年出生,是老大,后头一个紧挨一个,共有七个弟弟,没有姐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从小就很懂事。读初中,从龙岗中学到河桥寺坞里有30多里山路,我每个礼拜都要走一个来回,从没坐过一次车,经常走到天黑墨黑,也经常半路上淋雨,家里买不起雨伞、笠帽;每次回家,都带足一个礼拜的菜,干菜、咸笋、腌菜、萝卜干,经常吃到馍臭出虫子,也不舍得倒掉,更不舍得食堂里买份菜;我的作业本上,字都是写得密密麻麻的,不舍得按行格写,那太浪费了。

我的衣裤都是自家纺出来的土布,自家裁剪做的,裤带则是我自己做的,穿破了的袜子,剪成一条一条,再接起来就是裤带。有一次体育课跑步时,我的裤带崩断了,只能边跑边拎着裤腰,羞愧得很不得地上有个裂缝,好钻进去。这一幕经历,对于一个14岁的少年,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耻辱。

我读三年初中只花过7分零用钱。那年龙岗有庙会,毕竟是孩子,庙会上有西



洋镜(也就是万花筒),2分钱看一次,我没忍住;看到一种凉豆腐,实在诱人,5分钱吃了一碗。用了这7分钱,其实很心痛的,也内疚了很长时间。我一学期的学杂费开支5元,相当于父母亲要卖掉50担萝卜。这7分钱,刻骨铭心。

第二年,我给村里一家伙上交了6000多元利润,轰动全县。

1959年,我龙岗初中毕业考进了昌化高中。

当时的高中生比现在大学生还稀罕,但是,家里那么困难,我怎么能够心安理得继续读上去啊!两位老师特地上门来做父母工作,说这孩子是读书的好材料,不读太可惜了。罗老师还拿出六元钱要给我们家,当时老师一个月工资也就这么点。虽然这钱没肯收下,但我一直很感激这位好老师。

15岁,我初中毕业回生产队务农。当时初中生算是有文化了,一年后,大队安排我当“赤脚医生”兼兽医,算是技术人员。我很珍惜,工作认认真真,用心钻研医学知识。有些技能,到现在都有用,比如人畜常见毛病的诊断治疗,比如阉小猪。现在看起来,这都是为我命运转机所做的准备工作。

1966年10月份,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全村农户自己私养的一百多头猪都必须集中到了大队畜牧场统一饲养。畜牧场有十多名社员,两年不到,就养得只剩一头快死的母猪。大队支部书记找到我,他说,文华,你有文化,这猪场还是你顺着管吧!你再不管,这只母猪肯定也是死路一条,全村最后一希望也没了。

是那头母猪,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头母猪的样子:骨瘦如柴,大腿骨、背脊骨好像要戳破皮了,走路摇摇晃晃,随时要跌倒,叫起来有气无力。

接手前说好了的,我来养着试试,试好了卖猪的钱折算成分,按照当年的工分分值计算报酬。我照料这头猪,比照料自己的孩子还费心:给她吃磨碎的牛骨头猪骨头,给她吃有药用滋补价值的野菜,没有钱买精饲料,我给她用菜籽饼配制饲料。按照当时的说法,菜籽饼有毒,不能喂猪,但我试验成功了。我现在的“文华饲料”也用一部分菜籽饼做原料,还是获奖产品呢。

功夫没有白费,母猪发情了,生了一窝12头小猪,6公6母,第二年迅速扩大到了一百多头的规模,到1970年,已经是全临安县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畜牧场。

这十年,无论防疫治病,还是饲料配制,还是畜牧场的管理,我都积累了一套管用的经验。通过养猪,我们两兄弟相比其他社员,收入也还不错;自然,村里也因为有个效益不错的畜牧场,工分分值也明显比其他村高出一截。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明确发文给“四类分子”摘帽,但当时农村早就不那么讲究出身成分了,我也已经是大队副大队长。这年10月,农闲时商量第二年的工作与生产计划时,我提出了“田地分到户,山林统一管”的大胆设想。我的设想,其实就是两年之后在全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写的这份方案,后

来被村支书撕了,说是救了我,否则,凭这份证据,我至少坐几年大牢。

对畜牧场,我也提出了个人承包方案,我每上交2元利润,折算10分工,到年底参加大队的统一分红。当时10分实际值八毛多点。刚提出时,支部书记不同意,说宁可大家一起穷,也不能搞个人发财,那一套是资本主义复辟。幸好,当时的临安县农村工作部部长吕开吉认为这是新生事物,是件好事,他派人下村来督促着,才总算签下了承包协议。

第二年,我给村里一家伙上交了6000多元利润,轰动全县。全大队10分工的分值从去年的0.8元蹿到了1.2元。村里人内心应该也是高兴的,但是有人一算我们俩兄弟的账,就不乐意了。按照上交的利润计算,我应得工分2800分,可以分到3000多元钱。这下,全村“红眼病”爆发了,有人说,这是个人发财,是搞资本主义,也有人说,这是剥削。其实都知道,全是我们一家人起早摸黑做出来的,剥削了谁啊。

村干部于是召开全大队社员大会,批判我,想让推翻协议显得名正言顺,最后,还是一位参加会议的上级干部说了句公道话,才按8000分工分给我,辛苦一年,我只得了个零头。

后来,借口说猪场这块场地要办茶厂,就停办了畜牧场。

但我养猪能手的名气,早已经全县闻名。



1984年,我不仅养猪出名,配制的饲料也出名。

1982年,全县最大的养猪场是国有於潜良种场下属养猪场,国家投资,规模最大时上千头猪。但是,创办十年来年年都亏损。县农村工作部部长吕开吉知道我当时英雄无用武之地,就带着良种场长一起找到我,要我帮助猪场摆脱亏损困境。他们开出两个条件:可以帮我转两个居民户口;给我月工资40元,已经高于当时的大学毕业生了。他们提出的要求其实也不高,只是希望能让养猪场逐年减少亏损。

我提出来,索性由我承包,在经济指标上,我自己主动提高:减亏不稀奇,我要尽早赚钱,但是赚到了四六分成。

他们乐了,没想到我没还价还主动加价。

1982年4月,我40岁,带着17岁的大儿子,还有一床铺盖、一张席子、几件旧衣服和10元钱,就这么离开故乡,到一个新地方开始新的创业。

那些国有员工,全部不要,初创阶段,还是样样都由我们自己来。我和儿子起早摸黑地做,做得牛一样辛苦,经常早上四五点起来,做到晚上九点多休息,自己种植青饲料,自己加工发酵饲料,自己清扫猪舍、铡草、喂药打针、阉割。只有到了特别忙的时候,才请一个临时工。

只过了八个月,首批肉猪出栏,就盈利了6000多元。第二年起就开始上缴利润,良种场甩掉了亏损包袱,索性把猪场资产折算了2万元抵给我。

1983年,我家就是“万元户”,临安第一批。参加了杭州市召开的表彰会,领导给我戴上大红花,说我是致富模范,要求我带领乡亲一起养猪致富。

1984年,我不仅养猪出名,配制的饲料也出名。不少养殖户找上门来,希望我多做些配合饲料,卖点给他们,我也就顺便做起了饲料生意。

1988年,我挑头把於潜80多个养猪专业户组织起来,成立了临安县於潜养猪联合体,这是全国第一家养猪联合体,《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做了报道。

联合体从配种、仔猪供应、防疫治病、饲料供应、肉猪收购、屠宰上市,提供一条龙服务。由于专业户得到实惠,信息灵通,销售价格明显高于国有的县食品公司。专业户高兴了,县食品公司却恼火了,生意一落千丈,经理找我说,他手下几百人要坐到我家家吃饭了。有关管理部门

要保国有食品公司,不让我们继续搞下去,联合体就这么解体了。

但是,於潜这一片区养猪的星星之火已经燎原。历年来,临安市市的生猪存栏数,於潜片区基本上要占三分之二以上。

当初我迁到於潜时,心里还憋着一股气,一心想着养猪赚大钱,主要是想争气争面子,做给寺坞里欺负我们瞧不起我们的人看看。做到后来,我发现那些都只能算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就看淡看透了。换个角度想想,如果没有早年的极度贫穷,我可能也得不到人生的磨炼,也不具备吃苦耐劳精神,也没有那么顽强的毅力,肯定也没有巨大的创业致富动力。吃一时的亏,不能算真亏,只要自己坚持努力,那些吃亏,迟早会变成成功的机会。



要不是从小的艰难困苦培养出了我坚韧不拔的性格,我恐怕还真的半途而废。

1988年,我正式办起了饲料公司,研制自己的饲料品牌,主打产品“中猪配合饲料”获得了省级新产品奖,饲料公司多年供不应求,生产场地也一搬再搬,越来越大。

养猪这么多年,还有一样本事我特别自豪:我对生猪市场行情的预测判断,可说百发百中。比如去年年初,我就预测,下半年生猪价格平均每担要从当时的500多元上涨到1000元左右,到年底实际价格就是1000元出头。今年,我的预测价格依然走高,但涨幅没有去年那么大,所以熟人朋友来问行情,我都劝他们抓紧多进小猪,适度扩大规模。

我这本事,全凭熟悉最底层的真实情况,比如上一年的经营状况、母猪存栏数量、饲料和原料价格波动、消费行为变化,甚至兽药企业生产销售情况,都反映着真实的市场趋势。今年,省物价局发来了聘书,请我当猪肉价格的预测专家。

养猪联合体因为当时的政策而夭折,却给了我一个启发:单打一的养猪,不如做出以猪为核心的产业链,可以大大增强抗风险能力,提高盈利能力。也就是说,几大主要环节,最好都由自己掌握:种猪、防疫兽医、饲料、养殖、屠宰加工、销售。几年前,我已经做到了前四项,销售这一块已经通过网络和自己的品牌专营店正在尝试,唯有屠宰加工这一块,一直是国家特许经营,带有一定的垄断性质。

我是看清目标一定要做的脾气,为了这屠宰场,我前后总共花了近10年时间,连看好的场地都换了5处,累计跑政府部门总有400来趟。我据理力争,才算在2011年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现在想想,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要不是从小的艰难困苦培养出了我坚韧不拔的性格,我恐怕还真的半途而废。



我的主要消遣,就是厂区两亩多空地上种菜,种有机菜

我现在放手让儿子、儿媳接班,养老享福。我的主要消遣,就是厂区两亩多空地上种菜,种有机菜。从小节俭惯了,好像没多少需要花钱的地方,除非请客,从不去高档消费场所,出差外地从来只住小旅馆,吃快餐方便食品。

我的儿子、女儿,也都养成了节俭好习惯。儿子女儿在一所中学读书,那时家庭条件已经比一般人家好多了,但是他们在学校食堂吃饭,都是两个人拼吃一份菜。小儿子九十年代初在读浙师大时,一块洗脸毛巾,用得全是破洞,被同学扔掉了才换条新的。当时,他的同学都以为他家特别困难,他也不解释,直到后来他们看到报纸上报道,知道他爸爸竟然给教育基金捐款万元,才知道是完全误解他了。

我们家,明确的家训也谈不上,但都是上辈人以身作则,子女自然跟样学样。但家风那是肯定有的,我自己总结起来,应该有这么几条吧:诚实守信、勤俭节约、认真坚持、吃得起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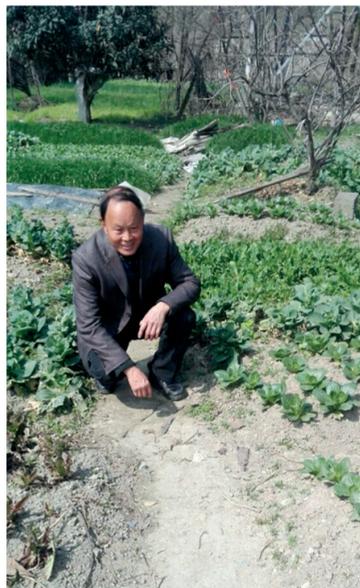
说起来,我的人生大体上完美,但难免有些无法弥补的遗憾。主要有三个,第一,大儿子17岁就跟着我干活,有段时间他眼睛得了病,我自己一直忙着,没有重视,穷苦人家习惯了不拿小毛病当回事,所以没及时去医院,还让他长时间铡草料,灰尘蓬天的环境里,把一只眼睛弄坏了,几乎没有视力。作为父母,我心里一直蛮内疚的。

第二个遗憾是我老父亲,身体特别好,

86岁还养20多头猪,上过《临安报》的。他一辈子勤劳,90多岁还顽固地非要干活,他身体样样都好好的,却意外跌了一跤,跌死了。我后悔没能早点做通他的工作,让他歇下来享福,否则活个一百多岁没问题。

第三个遗憾是,曾经有好机会上门,本来可以迅速把企业做得更大,却被我轻易放过了。1988年,当时的省委书记薛驹、副省长许行贯和临安县委书记管竹苗来视察猪场,赞赏我取得的成绩,同时主动提出要为我提供200万元的政府贴息贷款,用于扩大生产规模。我听得吓坏了,以前我一直是靠自有资金做企业,有多少实力做多大的事,感觉心里踏实。突然要我欠债200万元,万一搞砸了,这笔债不得压着我全家几十年啊!我硬是推掉了领导们的好心好意。那机会,实在是千载难逢啊。

人活一世,不可能没有磨难、羞辱、痛苦,但是,只要自己内心有信念,认对了的原则坚持做下去,这辈子你就不会吃亏到哪里去的,总会有好的回报在等着你。



说亲身经历

《倾听·人生》新书《梦想合唱团》面世啦,各大新华书店、晓风书屋、当当网、杭报新闻大楼1703室有售。

看世道人心

读稿人

勤

丑丑

一个出生在山里的穷孩子,仿佛命运并不垂青于他。因为穷,遭受过歧视,吃过很多苦。他一直很努力,也很用心,起早摸黑吃比常人更多的苦,只为活下去。四十不惑的年纪,大多数人解甲归田认命的不惑年纪,他却意气风发才开始出发。

他说,他的命运是被一头母猪改变的。我却不同意这么认为,一个拥有信念、善良且坚韧不拔的灵魂,命运的转机不在这里,便在那里,因为命运始终掌握在他自己手里的。在很多人眼里,他已经很成功了,家产千万,子孙有成,仿佛剩下的日子可以逍遥享乐了。他还是那么勤俭。

他用自己的行为为子孙树立了榜样,传下了好家风。他的故事,让我想起两个古老的成语:厚德载物,勤俭持家。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